



从“造物”到“做事”：工程哲学本体范畴的嬗变及证成

张云龙

西北工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西安 710129

摘要：“造物”作为本体范畴，确定了不同于传统哲学的研究对象、内容、范式和本质特征，开启了工程哲学这一哲学的新大陆。然而，夯实工程哲学的形而上学基础，回应社会工程的挑战，已经成为蓬勃发展的工程哲学必须解决的当务之急。源于语言哲学日常语言理论的“做事”一词，既有语言哲学的理论支撑，又能弥合“造物工程”与“社会工程”的割裂，还有助于工程哲学的扩展与传播，具有作为工程哲学的本体范畴的合理性。

关键词：工程哲学；本体范畴；造物；做事

中图分类号：N0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969(2022)04-0303-8

引言

李伯聪教授1993年发表的《我造物，故我在——简论工程实在论》一文，不仅明确提出“我造物故我在”这一哲学箴言，而且明确强调把“工程哲学”作为一个新领域进行研究。^[1]近十年之后，《工程哲学引论——我造物故我在》（以下简称《引论》）于2002年7月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工程哲学理论体系，这一部“现代哲学体系中具有开创性的崭新著作”（见路甬祥院士

为本书撰写的序言），以“造物”为本体范畴，提出和分析了如计划、决策、目的、运筹、制度、操作等50多个概念，构造了工程哲学的范畴系统。^[2]陈昌曙教授评价说：“工程哲学作为一门哲学分支，其研究内容要关注造物和用物的问题。”^[3]的确，工程即“造物”，“造物”乃是理解和进入工程哲学的不二法门。20年间，围绕“造物”活动，在中国工程院殷瑞钰院士的带领下，《工程哲学》（第1~4版，殷瑞钰、李伯聪、汪应洛等著）、《工程演化论》（殷瑞钰、李伯聪、汪应洛等著）、

收稿日期：2022-07-03；修回日期：2022-08-1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当代工程政治学的理论基础与本土关照研究”（20XZX003）；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工程政治学的中国话语构建研究”（2019A017）

作者简介：张云龙（1974—），男，博士，教授、副院长、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工程哲学、科技与社会。E-mail: zhyl629@126.com

引用格式：张云龙. 从“造物”到“做事”：工程哲学本体范畴的嬗变及证成[J]. 工程研究——跨学科视野中的工程, 2022, 14(4): 303-310. DOI: 10.3724/j.issn.1674-4969.22090201

Zhang Y L. From “creating” to “doing”: the evolution and justification of the ontological category of philosophy of engineering[J]. Journal of Engineering Studies, 2022, 14(4): 303-310. DOI: 10.3724/j.issn.1674-4969.22090201

《工程方法论》(殷瑞钰、李伯聪、汪应洛等著)、《工程知识论》(殷瑞钰、李伯聪、栾恩杰等著)陆续诞生,由中国人自己开创的工程哲学,不仅开拓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领域和新内容,而且成为国际哲学界的一道亮丽风景而备受关注。作为新生的研究领域和论题,工程哲学从其确立之后,就有非常大的拓展空间。作为工程哲学的创立者和开拓者,李伯聪教授在推广和传播工程哲学之余,从未停止对相关问题的思考和探索。迨至近两年,“做事”这一日常化的概念进入他的思考语境。在笔者看来,从“造物”到“做事”,看似简单,实则集中体现了李伯聪教授关于工程哲学思考的转向。本文拟对这一问题进行初步探讨,一方面是对《引论》出版20周年的纪念;另一方面,试图籍此管窥李伯聪教授的思想转向,探索工程哲学的未来发展。

1 “造物”的哲学意义

物理学家薛定谔指出,19世纪下半叶,科学爆炸性地迅猛发展,与之相伴的还有工业与工程,对人类生活的物质特征产生了极大影响。^{[4]114}的确,近现代以来,培根“知识就是力量”的宣言,“指出了一条更广泛地、更正确地认识自然界的大致上正确的康庄大道”。^{[5]192}理性“知识”而非天启“信仰”成为现代生活的新的图腾。伽利略、牛顿、麦克斯韦等科学家成为照亮黑暗世界的明灯,而科学则被视为“人类心灵的最伟大的胜利”。^{[5]原序}面对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哲学家们显然不会视而不见,“科学知识何以可能”乃至“认识何以可能”因此成为近现代哲学的主题。经由笛卡尔、洛克、休谟、康德等人的辛勤耕耘,认识论的成果蔚为大观,这一点在哲学的“蓄水池”康德那里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也即是说,关于科学的哲学乃是近现代认识论哲学的一条主线,康德之后的哲学家们在继承其伟大遗产的同时,也开启了新的领域,由卡普、德索尔、齐梅尔等人开启的技术哲学就集中体现了后康德时代的哲学家“接着说”的勇气和精神。技术应该成为哲学的主题,或者如德索尔所

言,应该成为康德“三大批判”之后的“第四批判”,技术这一长期被忽略的对象第一次成为了哲学的主题。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而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近现代的科技发展为哲学家们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质料,科学哲学和技术哲学逐步走向哲学的舞台。

然而,可惜的是,工程在这一过程中依然令人遗憾地“缺席”。尽管德索尔在其“技术制造批判”主题下,将“技术”与“工程”合二为一,但其强调的重心依然是“设计”而非“制造”,尤其重要的是,德索尔“轻视和贬低工业制造活动及其产品的意义,所以他未能真正触及‘工程哲学’的核心问题”。^{[2]46}纵观人类哲学史,“造物”和“工程”似乎从未登上大雅之堂,其原因在于,“造物”乃等而下之的“小人”或者奴隶的活动,从而使柏拉图等哲学家们“不可能把对工匠的哲学思考放在哲学理论的中心位置”。^{[2]51}其结果是,“劳心者”或者“思想者”的活动才是一等一的生活,才具有哲学上的优先性,因为哲学和思想的目的是追求确定性。美国哲学家杜威指出:“人们把纯理智和理智活动提升到实际事务之上,这是跟他们寻求绝对不变的确定性根本联系着的。”^{[6]3}之所以如此,在于人生活在危险的世界之中,便不得不寻求安全。由于外在实践与生俱来的不确定性,因而人类只能诉诸于内,也就是转向纯认知活动,这是“最悠久的哲学传统的意见”。^{[6]5}徐长福教授因此认为,这一以柏拉图为代表的理论优先的传统影响深远,“不仅直接受其影响的西方思想史一直延续着这种错误,而且那些没有柏拉图传统的非西方思想史同样充斥着这种错误,这是人类思维的一大通病”。^{[7]13}故而,新的时代要求哲学家不要沉溺于理论思维或者哈贝马斯所谓的“意识哲学”(philosophy of consciousness)的范式,而是要面向生活世界,开启传统哲学和近现代哲学缺失或者遗忘的“哲学板块”。时代呼唤新哲学,工程哲学应运而生,并以其创新性构成了哲学地图的“新大陆”。

在《引论》绪论中,李伯聪教授明确界定了“工程”一词的含义:“在本书中,我们将把工程这个术语一般性地界定为对人类改造物质自然界的

完整地、全部的实践活动和过程的总称。”^{[2]8}“改造”“实践”两词具有鲜明的马克思主义色彩。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哲学乃是德国古典哲学终结之后的产物，“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这一宣言宣告实践哲学的诞生。^{[8]139}何为实践？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表述得非常清晰，实践是“感性的人的活动”，也就是“对象性的活动”，主要就是人类改造自然世界的“造物活动”。^{[8]137}然而，在理论优先的传统中，这种对象被视为“卑污的犹太人的表现”，被列入低级活动而难入哲学的法眼。马克思写道：“理论的对立本身的解决，只有通过实践方式，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力量，才是可能的；因此，这种对立的解决绝对不是认识的任务，而是现实生活的任务。”^{[9]80}从古希腊以来，实践、造物均处于沉思和理论之下，马克思一反传统，真正实现了古典哲学乃至整个西方哲学的根本转向，芬伯格对此一语中的：“马克思为革命找到了一个全新的基础。”^{[10]59}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诞生改变了整个人类世界，其“实践精神”真正将哲学从理论的天空拉到了世俗的世界。然而，对于后人来说，仅仅恪守“实践”概念、解释“实践”概念，仅仅“照着说”，显然不符合哲学的基本精神。与时俱进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否则，“寻章摘句老雕虫”，又怎能发展马克思主义？马克思阐明了实践的本体论意义，实践形态多种多样，既包括政治实践、伦理实践、军事实践，还包括生产和工程实践，其中工程实践最基本、最重要，理应是“实践哲学”进一步发展的“第一支柱”。然而，“以往的哲学家忽视了这个建设‘实践哲学大厦’‘第一支柱’的工作”。^[11]而以“我造物故我在”为箴言的工程哲学，其基本问题是“人能否改变自然界（物质世界）和应该怎样改变自然界（物质世界）的问题，它要回答‘人应该怎样做’和‘人怎样去行动’的问题”，可以简要地将其说成是“关于‘做（doing）’、‘赋予（the giving）’和‘所为（things made by man）’的哲学”。^{[2]30-31}由此可见，从一般的“实践”走向“造物”这一具体的实践形式，工程哲学本质上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

继承，并以具体的方式发展了实践哲学。因此，完全有理由说，马克思的实践哲学已经为工程哲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而工程哲学的出场，使得“哲学史上曾经失落的造物主题和作为‘造物主’的人的主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终于‘回归本位’了”。^{[2]32}

2 “造物”遭遇的困境

工程哲学出场之前，科学、技术和工程三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往往纠缠在一起，尤其是技术与工程的界限更是模糊。卡尔·米切姆在其1994年出版的《通过技术思考——工程与哲学之间的道路》一书中，开宗明义地将技术界定为“人工物的制造和使用”。^[12]可以说，在工程哲学提出以前，关于工程的探讨更多地从属于技术哲学，工程这一人类基本活动从未成为哲学思考和探讨的独立对象。李伯聪教授以“造物”为核心范畴，提出了科学-技术-工程“三元论”，从而使“工程”成为与科学、技术处于同一层次的哲学范畴，这既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领域深化了有关研究内容，又改变了当代的“哲学地图”，开辟了“哲学地图的新天地”。^[13]尤其令人欣慰的是，“科学哲学和技术哲学都是首先在西方诞生，然后‘引进’到中国的。可是，在创建工程哲学的时候，我国一点也没有落后。可以说，工程哲学是在东方和西方同时兴起的，而且在不少方面，我国开拓和前进的步伐甚至还领先于西方一步”。^[14]然而，作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李伯聪教授从一开始就意识到工程哲学所面临的挑战，在他看来，工程哲学首先应该建立其“整体框架”或“整体环境”，只有这样才能将其与科学哲学、技术哲学区别开来，许多重要问题也才能得到澄清，因此，《引论》就成为一部“体系性”的著作，而不得不涉及诸多问题，而且不少都是“大问题”，“这就使书中对许多问题的分析难以避免地成为了浅尝辄止的分析和阐述”。^[11]自《引论》出版至今的20年间，李伯聪教授一方面努力向国内外学术界以及工程界宣传和推广工程哲学，另一方面则上下求索，不断思

考和解决工程哲学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重申一遍,“我造物故我在”如同“我思故我在”一样,宣告了新的哲学天地的诞生。如果说,“思”的哲学开启了近代的认识论,那么,“造物”的哲学则掀开了工程哲学,推进了实践哲学。认识论的大厦已经建成,工程哲学尚在路上。新生的事物总要面临诸多质疑,对于工程哲学而言,同样如此,而首当其冲的问题就是“造物”究竟能否完全涵盖“工程”,进而成为工程哲学坚实的本体范畴?就《引论》一书而言,“工程”一词的界定非常明确,就是展现人的本质力量的物质性活动,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实践概念的发展和延伸,故而,在这一语境下,“造物”简洁而准确地概括了工程的本质特征。直至今日,“我造物故我在”依然是工程哲学特有箴言,获得学界的广泛讨论,但问题也因此而不断呈现,而不得不直面的致命性问题就是来自“社会工程”的巨大挑战。乍一看,“社会工程”与“造物工程”之间的区别非常明显,“造物工程”在于建造人工的世界,而“社会工程”则是“通过制度设计和制度变革”改变社会的活动,旨在创造更加美好的社会世界。^[15]显然,由于对象不同(“造物工程”的对象主要是自然界,而“社会工程”的对象则是社会制度),因此,两者虽有“工程”作为核心词,但有本质性的区别。李伯聪教授在其唯一的一篇关于社会工程的论文中,认为“社会工程活动是讲规则、讲理由、讲说服的”,应该把“哲学修辞学”研究当作社会工程哲学的一个重要方面和内容努力进行新的理论总结和升华。^[16]“造物”与“说理”“修辞”判然有别,界限明显,似乎没有必要用更多的笔墨进行回应。

然而,这样的做法显然不能令人满意,因为哲学的任务就是以简驭繁、以一统多。人类文化的“轴心时期”,古代人已经开始用追求世界的统一性,力求用简单的概念去把握纷繁复杂的世界,“道”“太一”“原子”“数”“存在”等等概念,都是那个时代人类理解世界的本体范畴。这一方式和传统源远流长,以至于人们难以忍受世界的分类,追求“统一性”已经成为人类思维的根本目标,哲学如此,科学也不例外。如果某一领域存有不同

的概念,那只不过是暂时的,最终总会找到一个消除差异的统一性概念,故而,即使相对论、量子论和波动力学存有争议,但最终也“会归入某一个包罗万象的、统一的、单一的基本概念里去”。^{[5]21}爱因斯坦同样表示:“在世界图像中尽可能地寻求逻辑的统一,即逻辑元素最少。”^{[17]284}因此,“造物工程”和“社会工程”,即使其内容、对象和具体方式有所不同,但依然可以找到其共同点,即它们都是人类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而马克思的实践概念,并不仅仅是改造物质世界的活动,也包括改造精神世界和社会世界的活动,制度的变革在马克思思想中的地位同样重要,如果仅仅发展实践的“造物”层面而忽略其“社会”维度,就有将实践解读为“劳动”的危险,这显然有悖于马克思改造世界的基本精神。徐长福教授将工程分为两类:一类是有形的实物建构,一类是无形的关系建构、状态建构和符号建构,前者可称为“物质形态工程”,后者则是“人文社会工程”。这两类工程看似存在着“有形”(实体)与“无形”(虚体)的重大区别,但实则不可割裂,因为没有人文工程提供的观念和“理”,工程就会变成实体的盲目堆积,从而就不再成其为工程;反之,没有实体,工程就只能停留在图纸上,也同样不成其为工程。^{[7]21-24}与此同时,在工程伦理的研究中,把工程视为人类特有的实验,不仅是在设计的层次上,而且是在社会应用的层次上即作为社会实验,两者紧密相关,不可分割。而从广义上将人类的制作(making)与人类做什么事(doing),如政治、道德、宗教以及相关活动区分开来,这并不符合技术一词的词源(这个词在19世纪流行起来,指的是工业技巧)。^{[5]50,204}

质言之,“我造物故我在”一反西方重“思”的哲学传统,而将“造物和用物的问题置于哲学研究的重心和焦点的位置上”,^{[2]59}这的确有助于规定工程哲学的研究范围,其首创之功无论如何评价都不过分。但“伟大之思者必有伟大之迷误”,“造物”导致的对于工程的狭隘理解乃至工程本身的割裂,不仅是工程哲学需要解决的当务之急,而且也是李伯聪教授不得不回应的问题。

3 “做事”的出场

实际上，面对“造物工程”与“社会工程”的割裂，李伯聪教授并非没有意识。或许是为了工程哲学早日“自立门户”，或许是这个问题并非工程哲学创立之初的当务之急，《引论》中对此虽有提及，却并未充分展开，但我们依然可以从中感受到作者的基本态度。在关于工程哲学与社会哲学关系的讨论中，李伯聪教授明确承认：“工程哲学就其内容来看，是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对社会哲学问题的研究。更由于工程活动本身就是一种基本的社会活动，我们甚至有理由在某种程度上说，工程哲学本身就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哲学。”^{[2]398}与此同时，由于工程这个术语的泛化，例如“希望工程”“送温暖工程”等等，所以关于工程的诸多范畴，例如计划、目的、运筹、时机、决策、制度、运作等，对于其他类型的“微观社会学”在一定程度上也是适用的。就此而言，工程哲学属于一种“微观社会哲学”，从属于“宏观的”或“一般的”社会哲学，然而，遗憾的是，本书并未就这一问题进行更深入的探讨。^{[2]400}通过有限的篇幅，可以发现表述上的含混与逻辑上的矛盾：第一，如果工程哲学属于社会哲学，那么，“社会工程”哲学就应该具有造物的内容，这显然不符合关于“社会工程”哲学一般性理解；第二，“计划、目的”等具体范畴既可以用于“造物工程”，又可应用于“社会工程”，说明两者具有内在的共同性，其共同性就是它们的上位范畴，这一范畴又是什么呢？

“行动”（action）似乎可以承担这一角色。从西方来看，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意味着认识论哲学的解体，马克思主义哲学、尼采哲学、现象学、实用主义，现代西方哲学无一不关心、不探讨“行动”。萨特说：“一个人不多不少是他的一系列行径，他是构成这些行径的总和、组织和一套关系。”^{[18]19}在这个世界上，除掉行动外，没有真实。从此，“行动”成为哲学的核心概念之一，它与“思”一起构成了西方哲学一对范畴。而在中国传统哲学中，“行”与“思”则是等量齐观的概念，它们一起构成了探讨知和行的难易及先后的知行观。值

得注意的是，中国的“行”，主要是道德践履之“行”，也即是如何做人、成人，其目的在于“止于至善”。由此可见，“行动”是中西哲学共同关心的主题。任何哲学归根结底都是关于人的哲学，工程哲学也不例外。工程无非就是人的一种特殊行动，人正是通过各种各样的行动展现自己的本身。在和李伯聪教授交流中，他也认为行、行动、工程和实践，含义和对象基本一致。因此，如果用“行动”来概括工程哲学或者作为工程哲学的本体范畴，似乎更符合哲学的传统。

问题在于，如果可以用“行动”，是不是也可以“实践”？的确，“从工程出发看世界和从实践出发看世界在大思路上是是一致的，都属于马克思式的实践哲学的思路”。^{[7]19}然而，实践范畴只是对抽象的或一般的人类感性活动的反映，并不包含人类感性活动的个别规定性，工程作为人类具体的、个别意义的“实践”，应该有其特有的本体范畴。故而，工程毫无疑问属于人类特有的“行动”和“实践”，但行动和实践作为一般性的范畴，并不能概括工程应有的个性。如何找到既符合哲学传统，又能弥合“造物工程”和“社会工程”割裂的合适范畴呢？

当代语言哲学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思路。人是语言动物，“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语言的基本单元是概念，中国古人称之为“名”。概念清晰明了，则表述精确而不致产生误解；如果概念含混不清，“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为了保证“成事”，必须“正名”，也就是澄清概念的意义。由于哲学的争论和混乱源于概念不清，无论本体论还是认识论均不能解决这一问题，20世纪的语言哲学因此明确宣称：“哲学归根到底是对语言的思考。”^{[19]14}语言哲学的成果尤其是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理论”和日常语言理论，带给工程哲学新的启发。米切姆指出：“工程哲学的语言哲学进路应该将工程视为一种特殊的语言游戏。尤其是，应该注意，工程哲学——几乎和其他所有的哲学分支一样——可以从工程的定义开始……基于语言哲学的视角，工程哲学并不适合从我们的许多工程经验出发，而适合从我们通常谈论这些经

验的语词出发。”^[20]

李伯聪教授同样注意到了语言哲学“许多令人耳目一新的成果”，在他看来，语言哲学的分析方法，是一种“哲学利器”，应该将“工程哲学的著作作为‘对象语言’和‘文本语言’对其进行认真的语言结构分析、语义分析和语用分析”。^[21]⁴⁰⁴继而，李伯聪教授尝试性地用语言分析方法对认识活动和工程活动使用的语言进行了一些分析，指出了两者的根本性区别。他最后强调，工程哲学在注意语言之用的同时，“应该更加注意研究物质工具、机器、人工品之用的问题……任何认为‘物之用’不是一个哲学问题的观点或忽视研究‘用物’的哲学问题的观点，都是十分错误的”。^[21]⁴⁰⁵这一时期乃是工程哲学“自立门户”的初创期，一切都服务于“造物”这一本体范畴，20年之后“做事”的出场，不仅是对“造物”的超越，而且更有语言哲学乃至现代哲学和中国哲学的坚实基础，这在《人和事与人理和事理——兼论句型的语言学哲学研究》（以下简称《人和事》）一文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21]

4 “做事”的哲学意蕴

笔者认为，《人和事》虽是一篇短文，却具有标志性的意义，体现了李伯聪教授的思想转向。《引论》中，虽然提及了语言哲学的重要性，但并未充分展开。而在本文中，在强调“人”是哲学研究的关键范畴的同时，指出“人”与“事”不可分割，有人就有事，有事必有人，“人”“事”浑然一体。然而，直到20世纪，“事”才成为一个哲学范畴。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中国古代的哲学体系中，“天命观”对“人为观”占据了压倒性优势地位。而在西方哲学中，源于古希腊的知识论的对象则具有客观性的自然和宇宙，人事只是伦理学的对象，前者属于理论理性，后者属于实践理性，理论优于实践。与此同时，语言哲学关注的是陈述事实的“主-系-表”句型，本质是关于系动词“be”的哲学也即本体论问题，而对“主-动-宾”句型关注不足，也就是遗忘了“do”，“do”也不是独立而纯粹的辞，而是有意向、有所指，其意向和所指就是“事”。由于“事”

不可能自行显现，而是“人”“做出来”“干出来”的，因此，关注和研究动词，在哲学深层就牵涉“关于动词和操作的‘事’的哲学”和实践哲学/工程哲学/行动哲学问题。李伯聪老师从语言哲学的视角把“事”升华为哲学范畴，在一定意义上实现了工程哲学的形而上学奠基，而“做事”这一日常化的表述，相比于“造物”，更具学理和实践上的合理性。

加拿大哲学家伊恩·哈金（Ian Hacking）曾经概括了语言哲学的两条不同路径：其一，只要提出许多好的定义，用以区分日常语言（common speech）中产生混淆的词语的不同含义，就会避免概念之间的陷阱。其二，只要充分关切母语并且澄清其蕴含的差异，就能避免概念陷阱。^[22]哈金力图表明，从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乃至今天有影响的哲学的价值，就在于通过改进日常语言而澄清语言，其主要途径就是创造出哲学的“人工语言”（technical language）。与之相对，对人工语言的批判则求助于日常语言，认为澄清就是关于日常语言固有丰富性的言外之意的反思性理解。前者属于语义学，而后者则表现了语用学的核心思想。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理论”和“生活形式”充分肯定了日常语言的哲学意义。可以说，日常语言扎根于文化传统，从而在交流、理解乃至传播方面具有“人工语言”不可比拟的优势，而“做事”恰恰就体现了这一点。

无论中西，传统上都没有将“事”作为哲学的主题，但均有关于“事”的表述。在中国古代，这既可见之于《尔雅》中“事，勤也”对“事”的一般释义，又可见之于《礼记·乐记》“事蚤济也”的判断，还可见之于《礼记·大学》中的“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的认识，《论语》56次谈到“事”，更是为人处世的经典。而在今天的日常表述中，“事败垂成、事半功倍、事倍功半、事必躬亲、事件、大事、小事”等等表明，“事”已经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用语，而“人事”这一重要概念更揭示了“人”与“事”须臾不可离也！而在西方，“实事”或“事物”作为哲学概念，可以回溯到古希腊人那里。古希腊人用两个词来表示我们所谓的“实事”或“事物”即：*crema*和*pragma*。*pragma*是与*prattein*（即“行

动”)联系在一起的。^[23]现代现象学运动继承与发扬了这一基本精神,提出“朝向事实本身”的宣言。海德格尔认为,人被抛于世界之中,不得不与世界打交道,总是要处理各种“事”(人事与物事),从而总是处于“烦”的情绪之中,也就是心中“老有事”;如果无事,就会无聊,就会产生虚无,要生存,就要做事,“烦”就在所难免,“做事”是人的不可逃脱的宿命,理应在哲学上有其一席之地!

与此同时,“做事”弥合了“造物工程”与“社会工程”的割裂。上文述及,《引论》中李伯聪教授意识到两者的割裂,但并未充分展开。后面虽有“社会工程”方面的论述,但也并未探讨两者的差异与联系。直到《人和事》文中,才明确表示,“所谓‘工程’,不但可以指以改变自然界现状为目的的自然工程,而且可以指以改变社会现状为目的‘社会工程’。可以认为,广义的工程、广义的实践、广义的行动有基本相同的含义”。故而,“造物”可以概括狭义的“造物工程”,并不适用于“社会工程”,但既然都是工程,都是人类对于自身生活的筹划,又都具有计划、决策、目的、运筹、制度、操作等等特征,因此应该有一个涵涉两者的上位概念。做事,包含人事和物事,也就是“社会工程”和“造物工程”,这一日常语言不仅一举解决了遗留已久的难题,而且使工程哲学扩展了自身的疆界,工程界和社会各界可以在“做事”的语境下,共同开拓工程哲学的新境界、新内容!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作为日常语言,“做事”通俗易懂,而且亲切动人,不仅体现了“道不远人”,而且易于传播,有助于工程哲学的推广。伯聪教授在《引论》绪论中表示:“希望本书不但能引起哲学界同仁的兴趣,而且希望本书能引起工程界(包括现在未来的企业家、经理人、工程师、设计师、管理者、操作者等)和从事公共管理、政策研究等方面工作的人们的兴趣。”^{[2]2}长久以来,哲学只属于学习哲学的专业人士,对于专业之外的人来说,“实体”“质料”“形式”“理念”等等专业术语让人望而却步,最终使哲学如阳春白雪

而曲高和寡。马克思说得非常清楚:“理论一经掌握群众,就会变成物质的力量。理论只要能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本质。”^{[8]9-10}真正的理论,既能朝向事实本身,又能以其彻底性说服人。当代哲学家哈贝马斯认为,只有扎根于生活世界的语言才更容易获得交往主体的接受,“生活世界是互动参与者的资源。由此,互动参与者提出了能达成共识的命题。作为这样一种资源,生活世界……涉及到的不是形式,而是能够相互理解的内容”。^{[24]378}由此可见,源于生活世界的概念和语言因其具有共同的背景而具有可理解性。哲学的概念、范畴,如果通俗易懂,就能使“外行”也有理解和阅读的欲望和兴趣,而“做事”这一日常语言恰恰具有这样的优势。事实上,“造物”这一非专业术语已经在过去20年体现了这一点。工程哲学的蓬勃发展证明了,哲学事业的兴旺发达首先要从其基本概念出发,日常语言为我们提供了有力的途径。而“做事”相比于“造物”,具有更大的外延,更具日常语言的亲和性。“造物”也是“做事”,在“做事”的旗帜下,会有更多的人加入到这一事业中来。

5 结语

年逾八十的李伯聪教授,可谓“丹心未泯创新愿,白发犹残求是辉”,他借助语言哲学,运用“做事”这一日常语言,完成了工程哲学的形而上学奠基,这不仅弥合了“造物工程”哲学与“社会工程”哲学的分裂,拓展了工程哲学外延,而且因为日常语言的通俗易懂,使更多的人关心工程哲学、进入工程哲学。工程哲学在“做事”这一新的本体范畴的关照下,必将开出新的天地。如今,工程哲学可谓“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我等学人,亦应在李伯聪老师开辟的道路上,将工程哲学当成个“事儿”,恭敬奉事,为工程哲学的发展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参考文献

- [1] 李伯聪. 我造物, 故我在: 简论工程实在论[J]. 自然辩证法研究, 1993, 9(12): 9-19.
- [2] 李伯聪. 工程哲学引论——我造物故我在[M]. 郑州: 大象出版社, 2002.
- [3] 陈昌曙, 北辰甫. 开创哲学研究的新边疆: 评《工程哲学引论》[J]. 哲学研究, 2002(10): 73-74.
- [4] 埃尔温·薛定谔. 自然与希腊人, 科学与人文主义[M]. 张卜天,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20.
- [5] 丹皮尔. 科学史[M]. 李珣,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7.
- [6] 约翰·杜威. 确定性的寻求 关于知行关系的研究[M]. 傅统先,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 [7] 徐长福. 理论思维与工程思维两种思维方式的僭越与划界[M]. 2版.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13.
- [8]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卡尔·马克思.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一卷[M]. 中共中央编译局,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 [9] 马克思.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 刘丕坤,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9.
- [10] 安德鲁·芬伯格. 实践哲学马克思、卢卡奇和法兰克福学派[M]. 王彦丽, 葛勇义, 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22.
- [11] 李伯聪. 努力开拓哲学研究的新边疆: 访李伯聪教授[J]. 哲学动态, 2003(4): 2-6.
- [12] 卡尔·米切姆. 通过技术思考工程与哲学之间的道路[M]. 陈凡, 朱春艳, 译.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2008.
- [13] 李三虎. 哲学地图的新天地: 读《工程哲学》[J]. 哲学研究, 2007(10): 117-118, 121.
- [14] 李伯聪, 成素梅. 工程哲学的兴起及当前进展: 李伯聪教授学术访谈录[J]. 哲学分析, 2011, 2(4): 146-162.
- [15] 杨建科, 王宏波. 论自然工程与社会工程的关系[J]. 自然辩证法研究, 2008, 24(1): 57-61.
- [16] 李伯聪. 社会工程哲学中的三个问题[J]. 教学与研究, 2010(8): 17-21.
- [17] 爱因斯坦. 爱因斯坦文集: 第一卷[M]. 许良英, 等,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76.
- [18] 让-保罗·萨特. 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M]. 周煦良, 汤永宽,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2.
- [19] 陈嘉映. 语言哲学[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 [20] Mitcham C, MacKey R. Comparing approaches to the philosophy of engineering: including the linguistic philosophical approach[C]//Poel I, Goldberg D. ed. Philosophy of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An Emerging Agenda Dordrecht: Springer Netherlands, 2009: 49-59.
- [21] 李伯聪. 人和事与人理和事理: 兼论句型的语言学哲学研究[J]. 哲学分析, 2022, 13(2): 91-104, 197.
- [22] Hacking I. Why does language matter to philosophy?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5.
- [23] 克劳斯·海尔德. 海德格尔通向“实事本身”之路[J]. 浙江学刊, 1999(2): 81-90.
- [24] 于尔根·哈贝马斯. 现代性的哲学话语[M]. 曹卫东, 等,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4.

From “Creating” to “Doing”: The Evolution and Justification of the Ontological Category of Philosophy of Engineering

Zhang Yunlong

School of Marxism, Northwestern Polytechnical University, Xi'an 710129, China

Abstract: As an ontological category, “creating” determines the research object, content, paradigm, and essential characteristics different from traditional philosophy, and opens a new philosophical continent: engineering philosophy. However, an urgent task for the flourishing engineering philosophy is to consolidate the metaphysical foundation of engineering philosophy and respond to the challenge of social engineering. The word “doing”, which originates from the common speech of linguistic philosophy, not only is theoretically based on linguistic philosophy but can also bridge the gap between creating and social engineering. It helps expand and disseminate philosophy of engineering, so it has the same rationality as the ontological category of the philosophy of engineering.

Keywords: philosophy of engineering; ontological category; creating; doing